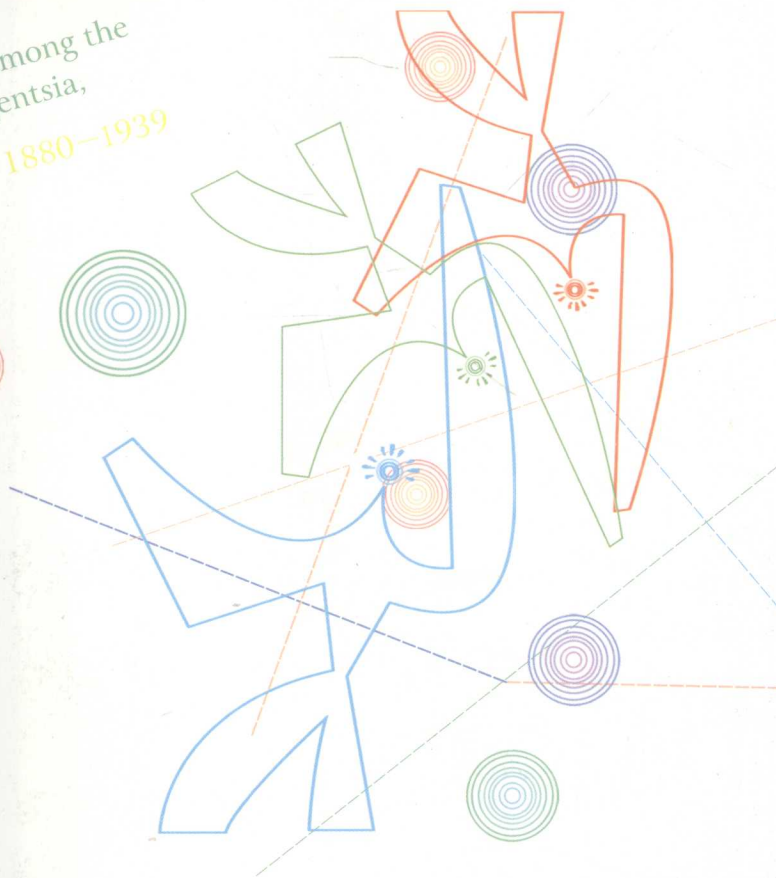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Pride and Prejudice among 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1880-1939

1880-1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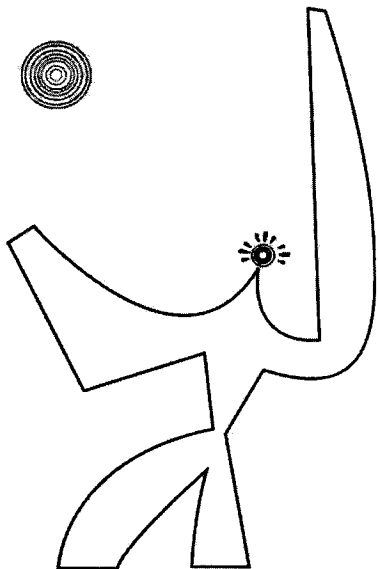
[英国]约翰·凯里 著
John Care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Pride and Prejudice among 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1880-1939

知识分子与大众

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 1880-1939

吴庆宏 译



知识分子与大众

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 1880—1939

[英国]约翰·凯里 著 吴庆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

(英)凯里(Carey, J.)著;吴庆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

书名原文: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Pride and Prejudice among
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1880~1939

ISBN 978-7-5447-1065-7

I. 知… II. ①凯… ②吴… III. 文学研究—英国—1880~1939 IV. 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5454号

Copyright © 1992 by John Care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oby Eady Associates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7-031 号

书 名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

作 者 [英国]约翰·凯里

译 者 吴庆宏

责任编辑 陈 叶

原文出版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200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652 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04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065-7

定 价 2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译者的话

在 1880—1939 年的英国文学界,艾略特、乔伊斯、劳伦斯、伍尔夫、刘易斯、吉辛、威尔斯、萧伯纳等都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们一直作为现代文学的开拓者,现代主义的急先锋,备受尊崇。他们的作品也被奉为经典,成为今日任何一位英美文学爱好者或学习者必读的书目。虽然他们的代表作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那么高深莫测,晦涩难懂,可是如果你讨厌它们,或者说无法参悟它们的话,那问题似乎总在于你的文学修养不够,欣赏水平太低。

然而,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英语教授、英国著名的批评家约翰·凯里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问题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知识分子身上。他认为:“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可以看作是对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应。”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人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改变,人口膨胀、城市扩张、教育普及、民主浪潮风涌及大众文化的兴起都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教育的普及使普通百姓都能读书识字,而且科技的进步使他们能轻易获得廉价的简装版经典文学著作。这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文学成了一种商品,大众成了其消费主体。投资、大规模生产、抢眼的广告宣传、大面积市场覆盖和巨额利润——这些企业的常规手段已开始移植到文化生产中,大众的兴趣和品味可能

决定作家的成败得失。结果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相信：文学正在消失，或者说文学退隐了。作家不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启蒙者，而更像一个向市场供货的生产者。著名评论家 F. R. 利维斯在 1930 年发表的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指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危机”，大众媒体——广播、电影和报纸已导致“文化标准被颠覆”。毋庸置疑，知识分子正面临来自“大众”对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权威的挑战，他们很可能将被从文化中心推到边缘，为此他们惶恐不安，满怀焦虑。为了重新获得对用文字方式记录的文化的控制，他们采取的最直接的方法是：使文学变得让大众难以理解，以阻碍大众阅读文学，进而将大众排斥于文化领域之外——这便导致了现代主义的产生。它不仅变革了文学，还变革了视觉艺术。它既抛弃了那种被大众欣赏的现实主义，又抛弃了逻辑连贯性，转而提倡非理性和模糊性。根据现代派的理论，大众在文学和艺术上总是错误的，只有那些为数不多但拥有突出才智的知识分子精英才能创造艺术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现代派试图贬抑大众的文化教养，抵制激进的社会政治、民主和文化教育的变革。他们自称“天生的贵族”，故意以难懂的语言、陌生的主题和高傲的态度从事创作试验，所以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反人民大众的一种阴谋。

凯里写道：“我觉得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是围绕这样一个原则形成的，即排斥大众、击败大众的力量、改变大众的读写能力和否定大众的人性。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这一知识分子的成果拒不承认：大众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大众是不可知也不可见的人的隐喻。我们只看到人群，而看不到大众。大众是人群极抽象的方面，是所有可有人群的总和，只有作为隐喻才有概念形式。大众的隐喻服务于个人专断的目的，因为它把人们变成一个集团，否认他们具有我们和我们所了解的人所具有的那种个性。”凯里指出，其实“大众”只是知识分子虚构的

一个概念,用来代表不可知的众多人类生命。知识分子和大众实际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它们两者构成了隐性的二元对立结构,没有人能提供确凿的“大众”花名册。传统上,知识分子习惯地认为大众具有专门沉迷于事实和普通现实主义的特性,大众顽固的写实主义使他们不适宜欣赏艺术,从而摒弃更高的美学追求。在知识分子眼中,大众或恭顺驯服、或愚蠢无知、或野蛮无理、或原始简单。事实上,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绞尽脑汁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构造大众的形象,他们提出了种种理论构想,试图把大众“科学地”等同于野人、妇女、儿童、细菌或动物。例如,德国哲学家尼采笔下最常见的大众形象就是一群动物,有时还会将大众描绘成一群毒蛾,或毁坏生机勃勃的组织的雨点和杂草。无论如何,知识分子构想大众形象的目的只有一个:剥夺大众的人性,把知识分子从大众中分离出去,攫取语言赋予他们的对大众的控制权。为了实现知识分子对大众的统治,弗洛伊德还把大众和“罪恶”相联,用无意识的需要来证明对大众进行政治镇压是正当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权镇压大众,因为他们早已抑制住大众的无意识在自己灵魂中的增长。

望着自己的对立面,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觉得,大众天生低劣,而把自己拔高为天生的贵族和永恒价值的传导者。他们甚至认为,大众似乎不仅是堕落的、危险的,还是不完全有生命的。他们对大众有一种普遍的主观臆测,即大众缺少灵魂,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非人。在处心积虑地通过种种诡辩否定了大众的人性之后,他们开始幻想灭绝大众。劳伦斯就注意到毒气的功效并想象有个巨大的杀人屋来处死所有的蠢人。凯里由此向人们揭示出一个惊人的秘密: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界对大众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与尼采哲学和导致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思想前提密切相关,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派得为20世纪的灾难负责。为了进一步印证自己的观点,凯里又

进行了细致深刻的个案分析,他揭示吉辛相信大众是难以教化的,威尔斯把大众当作生物学的灾难,喜欢想象的新兴的大众文化将被瘟疫和原子弹所消灭,叶芝也希望他们在对抗受教育阶层的世界末日战争中毁灭,只有贝内特试图通过文学研究来拯救大众,而刘易斯则与希特勒一样反对民主……

总之,约翰·凯里的著作《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对现代之初的知识界发动了猛烈攻击,以清晰的条理和富于雄辩的论述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大人物们身上的阴暗面:他们蔑视和憎恨普通人,甚至达到了毁灭人性的地步。可是,用如此大胆新颖的观点一下子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受人尊重的有影响的文学偶像彻底打破,实在让人太过震惊和难以接受。所以,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任何一个现代文学或历史的研究者将发现,凯里的深刻著作既有启发性,又令人不安,是全面理解我们当今文化的基本读物”。毫不奇怪,凯里的这部著作一经问世,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不少人批评凯里在把英国知识界的势利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相联方面过于偏激,好像现代主义从逻辑上看会自动导致纳粹主义似的,太危言耸听。有学者还攻击凯里对现代作家具具有“惊人的偏见”,其论证过程耍弄了很多语言学上的花招。

身为象牙塔内学术精英的凯里竟站到大众一边,向知识分子投射重磅炸弹,似乎也是一件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有人猜测,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他对精英主义的冲击反映了一种失去理性的内疚,因为他和他两个成功的妹妹——一个是女校长,一个是高级经理——天生就比他那智障的哥哥拥有更多的机会。而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却在于:凯里一向反对那种认为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价值,或文化应该有高尚和低俗之分,或社会应有高层和低层之分的思想观点。他曾说过:“我认为财富的分配令人厌恶。”他相信所有人的精神平等,每个人都应该

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无论他出自什么背景。“自由、平等和博爱”其实最早就是由西方知识分子提出的口号,历史上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曾是民主的积极推进者。但在平等思想深入人心和民主政治蓬勃发展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却因为害怕大众的力量,而反对人人平等,反对社会民主。他们试图把人从知识上分出个上下之别,这与把人从财富和权势上分出个上下之别,根本没有多少不同,同样会伤害平等的建立,进而对民主构成莫大的障碍。知识本来就应当全民化,虽说当中可能有粗细深浅之不同,却不应该为一群所谓“分子”独占。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曾毫不客气地指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知识分子占有文化资本,虽然相对于占有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者,他们处于权力弱势,然而相对无资本者,他们又是特权阶层。一旦他们感到自己的特权受到挑战,他们就可能与大众为敌,像凯里所论述的那样,形成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倾向。无论如何,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应该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知识分子也不应该自尊自贵。那些因为有钱有势而耀武扬威者固然应当受到批评,那些因为才高八斗而对人不屑一顾者也应当受到苛责。知识分子在追求平等理想的时候,不应只想到要与比自身势力强者争平等、争自由和争民主,还应想到要让自己与一般平民大众平等,这才更有利于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与启蒙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一贯的信仰和情怀真正契合。作为社会文化批判者的知识分子,在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应该学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我想,或许这才是凯里撰写这部著作的初衷。由此看来,尽管凯里的批评可能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却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吴庆宏

2008年2月10日作于江苏大学

序 言

本书关系到英语文学知识界对新兴大众文化现象的反应。它指出,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可以看作是对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应,而如此巨大的读者群实际是19世纪晚期教育改革所造成的结果。它认为,现代派的创作旨在排斥新近接受教育的(或“半接受教育的”)读者,以保持知识分子与“大众”的隔离。

当然,“大众”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作为一种语言学的策略,其功能在于取消大多数人作为人的地位,或至少剥夺大多数人的显著人性特征,以使其使用者自以为是地高人一等。其实,这个词最初既不是运用在文化上,也不是运用在政治上,而是运用在宗教上。圣奥古斯丁曾写到过被宣告有罪的大众或地狱里的大众,他所谓的大众指的是所有人类众生,上帝令人费解地决定拯救的少数选民除外。^① 所以,就像我在第四章中所证明的那样,即使在现代知识分子中,仍有人相信上帝意欲谴责大众。奥

^① 参见奥古斯丁的《手册》,见《教义的一般阐释》,J. 里维埃编,《圣奥古斯丁作品集》,第9卷,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1947年,第152,346—347页;《驳两封远洋来信》,第2本,第13段,见F. J. 宋纳德,E. 布鲁森和A. C. 德韦编,《作品集》,第23卷,1974年。另见拉丁文《圣经·罗马书》9:21中“大众”一词的用法,奥古斯丁所说的“大众”一词就源于此。

古斯丁希望,那些得不到上帝救赎的人将在地狱中烧毁,而这种通过火化来处置多余“大众”的基督教既定先例,在 20 世纪希特勒的死亡集中营里,又得到了实际运用。这就是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所指出的。

本书最初的四章均以我于 1989 年 11 月在肯特大学所作的纪念 T. S. 艾略特的演讲为基础,我另外加上“个案研究”部分,是想证明演讲中的想法也适用于其他许多独特的作家。这些作家个个都意识到(虽然方式各别)“大众”是新的挑战者,而我以前一直都没有机会写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我要感谢瓦莱丽·艾略特夫人、马修·埃文斯、罗伯特·麦克拉姆及其他法伯公司的领导,感谢法伯公司邀请我去作纪念 T. S. 艾略特的演讲。我也感谢艾略特学院的校长雪莉·巴洛、比尔·贝尔、凯斯·卡罗宾、大卫·埃利斯、克里希南·库马尔和迈克尔·埃温对我在坎特伯雷的热烈欢迎和给予我的热心反馈与批评。我在他们中过得非常愉快,获益匪浅。

本书关于威尔斯的两章论述的开头部分,曾以稍短的形式在 1990 年拉伊文化节上作为关于亨利·詹姆斯的演讲内容。我很感谢邀请我并资助这场演讲的爱恩·马丁博士和书商巨头安东尼·内维尔。马丁博士和她的丈夫还在拉姆屋热情招待了我,使我意外地(并相当不恰当地,如果考虑到本书的一般要旨的话)有幸睡到了亨利·詹姆斯的卧室里。

事实上,我很难记录下所有被我打扰过并给我鼓励和支持的朋友和同事,那将形成一张很长的名单。不过,我还是必须提到戴维·波丹尼斯、戴维·布拉德肖、马丁·格林、戴维·格里尔斯、彼得·坎普和克拉格·雷恩六位,感谢他们的宝贵意见和鼓励。

约翰·凯里

牛津大学默顿学院

1992 年 3 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译者的话 | 1 |
| 序言 | 1 |
| | |
| 第一编 主题 | 1 |
| 第一章 大众的反叛 /3 | |
| 第二章 改写大众 /26 | |
| 第三章 郊区居民和职员 /52 | |
| 第四章 天生的贵族 /80 | |
| | |
| 第二编 个案研究 | 103 |
| 第五章 乔治·吉辛和难以教化的大众 /105 | |
| 第六章 力图消灭大众的H. G. 威尔斯 /133 | |
| 第七章 H. G. 威尔斯的自我对抗 /152 | |
| 第八章 填补沟壑:阿诺德·贝内特 /172 | |
| 第九章 温德姆·刘易斯和希特勒 /207 | |
| 温德姆·刘易斯和西方的女性化 /208 | |
| 阿道夫·希特勒的知识分子计划 /225 | |
| | |
| 后记 | 237 |
| 索引 | 246 |

第一编 主题

第一章 大众的反叛

关于 20 世纪早期出现的大众文化,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曾代表知识分子作了典型的描述。在 1930 年出版的英译本名为《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奥尔特加首先表达了对人口爆炸的担心。他指出,欧洲有史以来,从 6 世纪到 1800 年,人口从没有超过 1.8 亿,而从 1800 年到 1914 年人口却从 1.8 亿上涨到 4.6 亿。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欧洲制造了“一个潮水般涌向历史胜地并将其淹没的巨大人流”。^①对此,即使一些思想倾向与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相左的作家也同样感到恐慌。例如,H. G. 威尔斯就认为,“新生人口过度云集”是“19 世纪的根本灾难”。^②

奥尔特加分析,人口增长会带来各种严重后果。第一,人口过度拥挤。火车、旅馆、咖啡店、公园、剧院、诊所、海滩等地,到处人满为患。第二,远胜于过度拥挤的侵扰问题。群众占据了人类文明为最杰出人士创造的空间。第三,大众的专政。大众拥有全部社会权力是当前欧洲政治

^①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经授权的西班牙原文英译本,第 54,119—120 页,伦敦:艾伦和昂文出版公司,1932 年。

^② H. G. 威尔斯,《基普斯》,第 240 页,伦敦:芳塔纳图书公司,1961 年。

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种“高度民主”的胜利造就了现代国家,而奥尔特加认为,现代国家实际上是对文明的最严重威胁。因为,虽然大众信任国家,把它当作能让其获得所期望的物质享受的核心组织,但是国家也会镇压个体。^①

奥尔特加的想法不禁让人联想到尼采的思想。尼采对我们将要关注的许多新生事物都有所预见。他同样也谴责人口过多,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宣称:“生者太多,他们依附在枝头太久,我希望有一场风暴来摇落树上所有这些腐败的虫食之物!”“暴民”饮水之地,所有泉水都有毒。查拉图斯特拉还谴责国家对个人的压制,说:“国家是冷酷的怪物中之最冷酷者”,“国家是大众的慢性自杀被称为生命的地方”。国家是为大众——“多余的人”发明的。在《权力意志》中,尼采表达的信息是:“需要高级人士对大众宣战”,并且宣战的时机十分重要,因为“各处的庸人正在联合起来使自己成为控制者”。尼采告诫道,这种“最卑微最愚蠢者专制”的结果将是一种“否定生命”的“无望而乖戾的东西”。^②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尼采看作大众文化最早的产物之一,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引发了尼采作为反抗者对大众文化本身的反对。他的思想在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中特别盛行,这表明大众的威胁激起了他们的恐慌。W. B. 叶芝把尼采推举为“平民粗俗行为传播的抵制者”,萧伯纳则认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胜过大卫圣歌的第一本现代著作”。但准确地说,尼采的追随者为了将其理论与社会主义、民主乃至女权主义相调和,似乎常常有选择地读尼采的著作。例如,颇有影响力的《新世纪》(该

①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11—13,18,24,131—132,135页。他的分析受到了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影响。斯宾格勒在“城市寄生居民”的“流动群体”中看到了西方文化走向没落的迹象。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查尔斯·F.阿特金森译,第1卷,第32—33页,纽约:诺普弗出版集团,1980年。

②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R. J. 霍林代尔译,第75—77,98,120页,哈蒙兹沃尔斯:企鹅图书公司,1961年;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沃尔特·考夫曼和R. J. 霍林代尔译,第75,382,458页,伦敦:威顿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68年。

书约有 80 条与尼采 1907 年至 1913 年间的著作有关)的编撰者 A. R. 奥拉格,发表过两篇尼采研究论著,论述都很片面,而他对尼采头脑的“白热化”崇敬却毫无保留。他报告道,尼采正在全欧洲“最有知识和最杰出者圈层内”被讨论。^①

尼采的大众观实际为大多数欧洲文化创造者所分享或预见。易卜生⁴在 1882 年发表的《人民公敌》中,展示了正直单独的个人是腐败大众的受害者;福楼拜早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发表十年之前,于 1871 年写道:“我相信,老百姓、大众、群众总是卑劣的。”他断言,任何人不管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提高大众的品质^②;伟大的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也为反大众的偏见提供了极端的范例。他于 1890 年发表的小说《饥饿》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现代派文本,以致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和纪德都对他心存感激,艾萨克·巴什尔维斯·辛格也称他为“现代派文学之父”。在他的《卡伦诺三部曲》中,主人公艾瓦尔·卡伦诺,一个奋斗中的年轻作家,就具有激烈的反大众观点,他的讲话实际上浓缩了汉姆生的尼采式大众观:

我相信天生的领袖、君主和统治者,相信自命的大众统治者,而不是推选产生的人。我相信并期待一件事,那就是伟大的恐怖分子和活生生的人权精神代表——恺撒的回归。

① 见戴维·S. 撒切尔,《尼采在英格兰,1890—1914》,第 93,148,186,235 页,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0 年;A. R. 奥拉格,《弗里德里希·尼采:时代的疯狂精神》,伦敦:T. N. 福利斯出版公司,1906 年;以及《尼采概述和警句》,第 169 页,伦敦:T. N. 福利斯出版公司,1907 年。

② 福楼拜一桑,《通讯》,第 342 页及其后,350 页及其后,巴黎:福莱马希翁出版公司,1981 年,引自赫伯特·洛特曼,《福楼拜传》,第 237—238 页,伦敦:麦修恩出版公司,1989 年。关于休斯曼和韦斯特勒等颓废主义运动领袖中的反大众问题,参见帕特里·布兰林格,《食物和娱乐:作为社会衰亡标志的大众文化理论》,第 113 页及其后,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 年。

最终在希特勒身上,汉姆生发现了他那伟大的恐怖分子,并成为唯一一名始终忠于希特勒的重要欧洲知识分子。他在希特勒自杀一周后,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深表敬意的讣告,赞美希特勒为“人类的勇士,全世界正义信条的先知”。“他的宿命,”汉姆生悲叹道,“在于他出现在一个最终将他摧毁的无比野蛮的时代。”^①

至于什么造成了文化名人所谴责的“大众的反叛”,这在欧洲各国情况各不相同。在英国,最为关键的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所倡导的全民基础教育立法。^②19世纪的老百姓和20世纪的大众之间的差别主要在阅读能力上,由于首次出现一个有读写能力的巨大人群,印刷物的制造和传播的各个方面都成为变革的对象。“以前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阅读大众,”H. G. 威尔斯评论道,“历来把世人分割成读者和非读者大众的那条巨大鸿沟现在已小得只剩些微教育程度上的差异。”^③

威尔斯有些言过其实,教育上的差别始终很悬殊。不过,确实发生了一场大变革,萧伯纳曾特别清晰地评估过这一点。他的小说《未臻完美》在1879年几乎遭到了所有出版商的拒绝,而回顾这一事件并探求其中缘由时,他终于意识到阅读公众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1871年的教育法,”他解释道,“把那些以前从不买书的人和那些即使有书也不会读的人变成了读者。”书商们发现,人们既不喜欢读乔治·艾略特的书,也不喜欢读“非常博学的”萧伯纳的书,而爱读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和《化身博

① 见罗伯特·费格森,《谜团:克努特·汉姆生的一生》,第1,164,386页,伦敦:哈钦森出版公司,1987年。

② 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案》对初等教育没有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是这一法案使得学校委员会能够制定地方法规实行强制入学,并且可以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缴纳学费。1876年《迪斯雷利法案》则规定惩处未能保证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父母以及雇佣无初等教育证书的童工的雇主。1880年教育法案又责成学校委员会制定地方法规以实行强制入学,至此英国完全实现了普通义务教育。直到1881年《初等教育法案》才规定对每个儿童都实行免费教育。

③ H. G. 威尔斯,《大空战》,第229页,哈蒙兹沃尔斯:企鹅图书公司,1979年;《世界史纲》,第647页,伦敦:乔治·纽恩斯出版公司,1920年。